

#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的共性与差异

## Общие черты и различия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странах по маршруту «Пояса и пути»

###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in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杨昌宇

扬州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文化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Ян Чаньюй,

профессор и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докторантуры,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ав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ав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Янчжоу,  
Янчжоу, Китай  
uscfsd163.com

Yang Changyu,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f La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uscfsd163.com

© Ян Чаньюй, 2022

DOI: 10.17803/2587-9723.2022.5.202-206

**摘要:**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家合作模式构想，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的经济合作区。“一带一路”沿线的俄语国家，是指“俄语”在这些国家中或被宪法确认为国语、官方语言、族际通用语，或以母语、少数民族语言等形式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俄语”为纽带的“语言国家群体”。本文主要研究了“东斯拉夫三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8个国家。俄语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民族、政治、宗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联系，这也导致了全球治理背景下各国语言治理的复杂性，并在各国语言法治化的基本路向中表现出共性与差异。共性主要表现为语言法治治理形式上的层次性、历史上的阶段性、功能上的政治性和目标上的多重性。差异主要表现为语言法治治理前提中国家语言能力的不同、国语法治化的程度不同、处理与俄语关系的导向性不同。这些共性与差异可以让我们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充分认识语言助推经济交往的功能、语言蕴含的正负能量、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语言与文化话语权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俄语国家 语言法治

**Abstrac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or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a new model of national cooperation advocated by China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with the widest coverage in the world today. The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 to the countries where "Russian" is recognized by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ficial language, interracial common language, or exists in the form of mother tongue, minority language, etc., thus forming a "language – state – group" with Russian as its link. Due to limited length,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three East Slavic Countries", namely Russia, Ukraine, Belarus and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namely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Uzbekistan and Turkmenistan.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v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ethnic, political, religious, linguistic and other links. This also leads to the complexity of language governance in various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hows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basic direction of language policy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commonaliti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hierarchy of forms of language policy, the stages in history, the politics of function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objectives. Th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nguage abilities of countries, the degree of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guidance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n on the premise of language policy.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help us fully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n boosting economic exchang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nergy contained in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xtraction of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language policy in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guage research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o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s always multiple and non-unita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Alliance", that is, the alliance of "Belt and Road"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se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nod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ut also important partners of China's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in different frameworks of exchanges.

The current prominent problems of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clude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interracial common languages with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e issues of language independence, cultural independence, and language sovereignty between countries. All these issues have essentially surpassed the basic function of language itself. In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overeign countries is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for culture. Only when we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cluding their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lans and language strategies, ca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 better and comprehensively supported.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Language Policy.

项目来源：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研究基金项目（18SHJD016）。

“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文化差异性最为突出的地区，在实现互联互通过程中，平衡沿线国家多元语言利益诉求需要处理好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主权、语言与安全、语言与话语权等诸多关系。<sup>1</sup>在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俄语是其中重要的官方语言之一，实际上可用其交流的国家有多个，主要是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笔者将这些国家概括地描述为“俄语国家”<sup>2</sup>，主要包括人们俗称的“东斯拉夫三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外高加索三国”即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sup>3</sup>。这些国家因其过去存在共同的历史时期，在当代语言法治方面存在很多共性问题，从而形成一种“语言国家群体”形象。面对复杂的语言问题，走语言法治化之路是上述各国的共同选择。从当前各国语言政策推行情况来看，各个国家均表现出法治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态势，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和差异，这一现象在注重规则治理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深远的意义。

### 一、“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中的共性问题

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之路既是多重文化渊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具有政治作用及身份和文化认同意义，在一定意义上则是在特定历史原因基础上俄国核心文化因素扩张与收缩的现实表现。各俄语国家均是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其语言法治中共性问题的产生具有多重文化渊源，其共性文化渊源包括民族文化的斯拉夫文化共源性、苏联时期深受同一性政治文化的影响、斯拉夫语言文化同源性三个主要方面。另外，在研究习惯上，斯拉夫学通常将一些非斯拉夫国家习惯性地纳入到斯拉夫研究范畴，这使得将这些国家放在一起研究成为可能。<sup>4</sup>“一带一路”沿线各俄语国家作为一个“语言国家群体”，它们之间存在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语言的等诸多方面文化上的联系，正是由于这些联系，促成了语言在各国的复杂性及其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共同趋向，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sup>1</sup> 梁昊光，张耀军：《“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与政策实践》，《学术前沿》，2018年5月下，第98页。

<sup>2</sup> 笔者曾另文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学术限定，认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俄语国家，是指“俄语”在这些国家中或被宪法确认为国语、官方语言、族际通用语，或以母语、少数民族语言等形式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俄语”为纽带的“语言国家群体”。限于篇幅，当时主要研究了“东斯拉夫三国”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8个国家。参见杨昌宇：《“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求是学刊》2019年第4期；杨昌宇《“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的表与里》，《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sup>3</sup> 除俗称的“东斯拉夫三国”、“中亚五国”、“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三国”所及的14个独立国家外，还包括摩尔多瓦，这15个国家都曾为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

<sup>4</sup> 参见杨昌宇：《“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求是学刊》2019年第4期，第83页。

### （一）语言法治治理在形式上表现出层次性

在语言学领域，人们更多地关注语言战略规划、语言政策等较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于规划如何落实、政策如何实施等法治保障性问题的关照不足。事实上，上述国家当前都将语言法治治理作为国内的重要领域来对待，在治理形式上表现出层次性，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各国均以宪法形式表达了鲜明的国语立场。一般而言，各国宪法中均包括国语条款，对国语和官方语言进行了确定。第二，各国均构建与宪法配套的语言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法》、《国语法》等单行法律。第三，对国家政策以法制手段进行积极的推进、落实与保障。比如俄罗斯，在国语实施方面以法定形式采取一系列措施。同时，各国在这三个层面的语言法治实践中，除俄罗斯要处理俄语与其他民族语言关系和地位外，其他国家无一例外地要通过法定形式处理本国语言与俄语的关系问题。

### （二）语言法治治理在历史上表现出阶段性

上述各国从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到主权国家独立初期、再到全球化时代面向世界的发展时期，不同阶段语言法治治理在导向上都存在差异，阶段性较为明显。在苏联“国语化运动”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制定语言法，通过语言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和使用领域。如199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制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语言法》，1990年白俄罗斯通过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1989年乌克兰颁布第一部语言法《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1989年塔吉克斯坦通过《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等<sup>5</sup>。在后苏联空间中，各国在已有语言法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首先表现在独立主权国家的宪法中，相应的语言条款表明了国家的语言态度；其次表现在《国语法》、《民法法》等相应具体的法律制度中；再次表现在社会层面的运用与教育领域的推行等。在当下不断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各国的语言治理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 （三）语言法治在功能导向上表现出政治性

与上述特点一脉相承的是，每一个阶段在语言治理上都无法排除其政治的成分。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语言法的制定被认为是其走向政治独立道路的第一步，它更明显地表现出民族政治的而不是民族文化的特点。<sup>6</sup>苏联解体各国独立初期，其语言法更多地通过对国语和民族及个人语言权利的规定反映出国家对语言主权的诉求。当下在世界日益开放各国不断互联互通的趋势下，在强调国家文化独立自信的时代，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多元。各国都在努力地构造一种社会标准，并保障和促进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语言法治化现象背后存在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正是在这种功能导向上各国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实践突显出了语言的文化职能，促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多元力量的发挥。

### （四）语言法治发展目标表现出多重性

在语言治理的目标上，语言承载了政治、民族、文化、主权、安全等诸多方面的价值。除俄罗斯以外，各国独立后在政治上继续保持“去俄罗斯化”的倾向，语言与主权问题密切相关。以法治化的形式追求和塑造本国的语言发展模式，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惯性，又存在与俄语割不断的联系。各国在处理俄罗斯族人的地位问题时不得不处理语言问题。在影响语言状况的基础性因素或主导性因素上趋同，都与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等问题相关联，并且这些因素间具有千丝万缕的相互关系，也成为当代各国语言问题突出的一个根本原因，既造成了各国国内的民族间语言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国际族际间语言问题。

## 二、“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的差异性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在语言法治上除一般的共性问题外，在实践中也表现出差异和区分。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各国家语言能力存在不同，这是语言法治中的基本前提性问题；各国家国语的法治化程度不同，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当代各国在处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与俄语关系时的导向上存在不同。

### （一）各国在国家语言能力上存在差异

各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差异决定了语言法治内容上的不同。国家语言能力不仅是软实力，而且也正在成为硬实力。它不仅体现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号召力和对外的隐性渗透力及同化力；同时，随着语言功能张力不断释放，日益成为助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全面博弈的时代，国家语言能力正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并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sup>7</sup>概括而言，语言能力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语种能力，即国家总共能够了解和使用多

<sup>5</sup> 俄罗斯学者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语言立法状况进行过相应的统计研究，从国别、法律名称和通过时间进行了明确的列举，可以清晰地了解苏联时期语言立法的基本情况。参见Губогло М. Н. Языки этническ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М., 1998. С. 194.

<sup>6</sup>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页。

<sup>7</sup> 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05页。

<sup>8</sup> 李宇明：《国家的语言能力问题》，《中国科学报》2013年2月25日，第7版。

<sup>9</sup> Белова С. А., Кропачева Н.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России: нормы права и нормы языка. СПб. : Изд-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8.

<sup>10</sup> 戴曼纯等：《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与民族整合》，《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4期，第19页。

少种语言；国家主要语言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外的地位；公民的语言能力；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水平；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等。<sup>8</sup>现在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注意力还在于对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外的地位确立和公民的语言能力的培养等基础方面，比如中亚各国家，在语言文字上通过从西里尔字母到拉丁字母的转换来彻底实现去苏联化，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少数国家则进入到高层级的语言能力培养发展阶段，比如俄罗斯对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投入很大精力，编制国语词典、统一俄语口语使用规范、强化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规范的司法监督等，这说明其国家语言能力正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sup>9</sup>当今世界，在多重合作框架下，俄罗斯采取了更多的举措和更大的力度来提升本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打造更强的国家语言能力。

### （二）围绕国语展开的语言法治化程度不同

有的国家不但全面建构和完善语言法律制度，在教育和司法层面的保障也愈加完善，有的国家则尚处于法治化的初期。这种发展程度不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分别开始就语言问题进行立法。外高加索三国即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分别在1978年宪法中对语言问题作出规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种主体民族语言具有本共和国国语地位。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分别于1990年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语言法，俄罗斯于1991年通过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俄联邦各民族语言法，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则分别于1989年通过各自的语言法或国语法。苏联解体后，各国纷纷制定或完善各自的语言法制框架，希望通过法治方式来解决语言领域的一些难题，主要有围绕国语而展开的主体民族语言的地位及使用、俄语的地位及使用等问题。比如立陶宛政府规定，公共部门雇员必须通过立陶宛语委员会批准的语言测试，申请入籍者也要达到语言要求；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则将语言要求扩大至公私全部领域，立法要求任何与公众打交道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国语能力，并对不同职业有不同语言水平要求。<sup>10</sup>吉尔吉斯斯坦规定参选总统必须通过国语考试，2009年有两位总统候选人因国语考试不合格而被取消参选资格，在2015年总统选举前，有人甚至提议对候选人应增加俄语考试。

### （三）各国处理与俄语关系时的导向不同

各国独立后，俄语使用领域开始缩小，致使行使功能也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有：从全民通用语到族际语；从主要教学用语到教学辅助语；从公文事务语言到公文辅助语；从主要传媒用语到次要传媒用语。<sup>11</sup>

各国在处理本国主体民族语言与俄语关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有的国家倾向于向欧洲标准看齐，积极融入到欧洲体系，挥手与俄语作别，比如乌克兰。有的国家迫于现实的需求缓和了国语与俄语的关系，比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各国在处理与俄语关系的法治化导向性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坚定派、区分派和游离派或实用派。以白俄罗斯为代表的属于坚定派，白俄罗斯宪法中将“俄语”与“白俄罗斯语”同时确定为国语。以乌克兰为代表的属于区分派，乌克兰宪法中的相关规定及其实践中做法都表现出强烈的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塑造特征。乌克兰1989年的《语言法》和1996年《宪法》，都规定乌克兰语为国语，俄语并没有被提及，但现实生活中俄语却行使民族间交流用语的功能，自2005年9月乌克兰签署《欧洲区域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之后，俄语地位变成了少数民族语言。以“中亚五国”为代表的游离派或实用派，在苏联解体取得独立国家地位后，在宪法中确立自己的国家语言，但在实践中不排斥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后来都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使俄语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中亚五国对待俄语的态度大致相同，具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即官方地位或族际语地位。

## 三、全球化时代语言法治共性与差异背后的思考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作用。<sup>12</sup>“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语种现象较为普遍，而各俄语国家形成的语言国家群体现象较为典型。当下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问题凸显，从其语言法治的表象中可以看到其对语言的多角度规范，从宪法确立、语言单行法和教育单行法的保障、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在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语言承载着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多重诉求，这也是今天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复杂化的原因所在。在倡导规则治理的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中存在的共性与差异现象，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 （一）深刻认识语言助推经济交往的功能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在国际金融、世界贸易、跨国工程文本、项目合同、谈判文书等领域使用的通用语言并不多，俄语是俄罗斯、中亚及独联体国家的通用语。中资企业公司跟这些国家签订国际经贸合同，绝大多数使用俄语，少数项目使用英语。我国学者将经济交往中的语言区分为通事语言和通心语言。通事语主要指可以签署国际贸易文本、可以用于国际经济贸易交际的语言。除了以英语或俄语为母语的少数国家及少数人口外，就大多数沿线国家人口而言，英语或俄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是世界语言，是国际贸易语言，是通事语言，但还不是通心语言。<sup>13</sup>比如吉尔吉斯斯坦，其官方语言不是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母语，而是俄语。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3个国家规定其国语分别为：土库曼语、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是，俄语在这3个国家中使用领域依

<sup>11</sup> 参见张丽娜：《苏联及俄罗斯语言策略的演变与俄语状况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94-97页。

<sup>12</sup> 周庆生：《“一带一路”与语言沟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52页。

<sup>13</sup> 周庆生：《“一带一路”与语言沟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53页。

然最广，承担官方语言和族际交际语言的能力依然最强，在地缘政治、劳务输出、教育留学、区域经济合作等方面，功能依然强大。出于维护本国国语地位的考虑，这三个国家并未确定俄语为本国的官方语言。

## （二）全面认识语言蕴含的正负能量

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维系特定群体的纽带，沟通不同群体的桥梁，社会运行的规程，具有凝聚力、正能量；另一方面，它也容易酿成矛盾甚至冲突，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旗号和借口，成为社会纷争的导火索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演化为离心力、负能量。<sup>14</sup>在上述国家中，语言地位的变化通常具有政治原因。在语言历史上，基辅罗斯时期俄语就是通用语，俄罗斯帝国时期俄语是唯一通用语言，苏联成立之后，虽然各加盟共和国都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俄语是苏联外交、教育、社会生活、公文事务领域的唯一语言。苏联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家语言策略、语言规划、语言政策都倾向于发展俄语，经过苏联时期近70年的发展，俄语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用语。1991年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语地位开始下降。以往在探究苏联解体原因时，很多研究者认为，语言上的冲突与分离促成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制定语言法，从而开启了走向政治独立道路的第一步。<sup>15</sup>如何全面认识语言中所蕴含的正负能量，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有特殊的意义。

## （三）充分认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新时代的语言安全问题正在成为语言学者关注热点问题，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上，语言具有国家建构功能和解构功能；在联结作用上，语言是安危攸关的社会纽带；在民族与国家认同上，语言不安全会伤及民族和国家的血脉。语言是国家安全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工具。具体而言，语言是社会交际和行政运行的基本工具；语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器；语言要求是国民身份建构的条件；通过语言规划来规划社会。<sup>16</sup>2015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俄罗斯国家联邦安全战略》，特别关注语言和文化在俄罗斯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强调其对于保持和恢复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意义。“俄罗斯在文化领域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俄语世界地位的下降……俄罗斯精神、道德价值观受到侵蚀，俄罗斯多民族统一性被削弱。”保证俄罗斯文化安全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保存和发扬俄罗斯传统，将其作为俄罗斯社会的基础……强化俄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保持与发展国家统一文化空间”。<sup>17</sup>

## （四）充分认识语言与文化话语权的关系

在各国国家治理实践中，语言法治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人们的关注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语言工具、语言权利，语言主权问题，上升到了文化话语权的高度。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的一个表现，代表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它是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建设、发展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sup>18</sup>当代各俄语国家既要面临民族国家构建的那些基本传统问题，同时还要面对现代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特别是从国际发展趋势上看，语言已经突破交际工具的传统角色定位，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抓手。各国在保障日常的教育语言、媒体语言、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语言等方面有效运行的情况下，不断深化。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状况让我们看到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各国对待俄语语言文化的态度、各俄语国家对语言文字的法律规制框架，让我们看到了各俄语国家如何通过法治化途径确立和维护各自的文化话语体系的共同取向，这其中更让我们看到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对“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中共性与差异问题的提炼，有利于促动语言问题研究从中国视角到全球视角的转换。“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家合作模式构想，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的经济合作区。全球化时代的合作总是多重的和非单一性的，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框架下和“一带一盟”的对接过程中，上述每个俄语国家既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节点，同时又在不同的交往框架中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与交往对象。“一带一路”沿线上俄语国家目前突出的问题既有一国之内的国语地位及民族语言问题，同时也有国家之间从语言独立性、到文化独立性、再到语言主权地位等问题，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的基本功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主权国家之间最高境界的交流是在彼此尊重文化基础上的互通与互鉴，只有对各国围绕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等领域的法治状况有一个基本清晰的认识，才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更好助力。

<sup>14</sup> 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6页。

<sup>15</sup>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6页。

<sup>16</sup> 参见赵世举：《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功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35-36页。

<sup>17</sup> 舒桂：《俄罗斯联邦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解读》，《中国信息安全》，2016年第1期，第123页。

<sup>18</sup> 参见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05页；《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功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32页。